走過百年

逾世紀的臺日「臺灣書寫」

文———吳佩珍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日有關「臺灣書寫」樣貌涵蓋了旅行文學、戰爭報導、對殖民政策的批判、原住民或臺灣風土等主題，本文由長期關注日本近代文學與臺日殖民文學的吳佩珍副教授執筆，呈現從18世紀至今，臺日文學作品中的「臺灣書寫」的發展脈絡。

早於十八～十九世紀，日本的旅行文學已經出現了所謂的「臺灣漂流記」。這些多為遭遇船難的漁船或是商船水手所留下的臺灣滯留記。其中最為臺灣熟悉者，一為1892年石井民司編著的《東京漂流記》，另一則為1803年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前者記錄1757年六名志摩國（今日三重縣東部的志摩半島）的水手遭遇船難，歷經臺灣的原住民、漢人部落，之後輾轉經由福州，最後得以返國。後者記錄北海道商船漂流至花蓮，船長文吉在當地度過了四年後才得以返鄉。這些紀錄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臺灣部落分布的狀況以及各族群的樣貌。

之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臺日政治力學失衡的開始。岸田吟香在此戰役隨軍採訪，成為日本第一位從軍記者。從保有江戶時期繪草紙形式的《風俗畫報》對這場戰爭的報導，我們可見進入近代化初期的日本對臺

皇民教育。（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文助口述，秦貞廉紀錄，《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譯本，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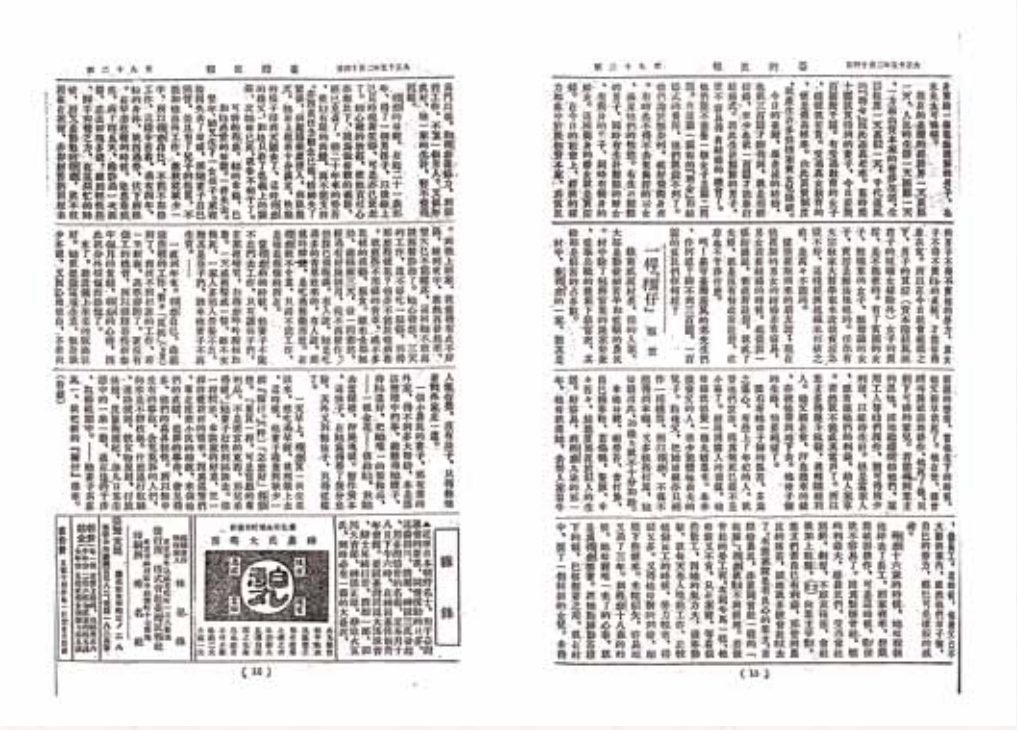
灣以及先住民的想像，開始擴張與膨脹。1894－1895的中日甲午戰爭成為日本彰顯其近代化富國強兵政策的成果，也讓臺灣成為其第一個殖民地。此後，臺日文學的交流不再停留於1895年之前片面的觀察與紀錄，而是隨著地政學狀況的改變以及人流與物流的變動，進入另一段逾越百年、愛恨糾葛的旅程。

日本前近代的知識體系，漢詩文乃日本知識人的基礎素養。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的征臺之役，軍醫森林太郎隨軍登陸臺灣征戰，還以森鷗外的身分留下其在臺紀錄的漢詩與日記。領臺初期，日本文人如中村櫻溪以及籾山衣洲，得以與臺灣仕紳以漢詩文唱和，其中吟詠臺灣風物主題的漢詩，俯拾皆是。

日本領臺後，臺灣人對於日本統治下人民苦境的文學書寫，例如賴和、朱點人等，或寫警察的暴虐，或諷刺殖民政策的不合理與荒謬，也有揭露殖民者強取豪奪的貪婪醜態者。日本領臺不久後出生的臺灣知識分子世代，隨著日本在臺教育制度，特別是日語教育的深化，或者是因臺灣受限的升學管道而遠赴日本升學，其書寫以及深度思考媒介逐漸轉向日文。

一九二〇年代於東京創刊的《臺灣青年》與《臺灣》，雖非純文藝雜誌，但已可見上述的書寫特徵。一九三〇年代出現的臺灣新文學世代作家則幾乎都以日語書寫。這些作家為書寫臺灣而苦思的痕跡，可從作品中「變體」日文的表現形式，窺見端倪。其文學作品呈現的與日本近代文學的「互文性」、殖民地臺灣風土的凸顯乃至對殖民政策批判的暗諷，讓常被比喻為具有混雜性（hybridity）特徵的殖民文學，不再僅止於混種語言使用的次元。臺灣作家對於殖民地臺灣書寫，也因文學流派的影響差異，各自以不同的文學技法，呈現臺灣不同的樣貌。楊逵乘著日本文壇普羅文學運動潮流，以〈送報伕〉登上日本文壇。「福爾摩沙」世代的張文環則以「寫實主義」技法呈現臺灣鄉間風物與人物，如〈辣韮譚〉（1940）、〈閹雞〉（1942）。巫永福與翁鬧則被認為受日本新心理主義與新感覺派技法影響，其所書寫的普羅文學則與忠實的普羅文學信仰者楊逵等人的作品形成對照，呈現迥異的風貌與氛圍，如〈愛睏的春杏〉（1936）以及〈羅漢腳〉（1935）。日本近代文學中的普羅文學以及新感覺派中，也能發現類似的現象，最顯著者如橫光利一的〈上海〉便是以新感覺派文學技法處理普羅文學題材的典型例子。

日本領臺後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仍以旅行文學為主流，這些作品多為日本作家來臺進行



賴和，〈一桿「稱仔」〉，《臺灣新民報》第92號，1926年2月。影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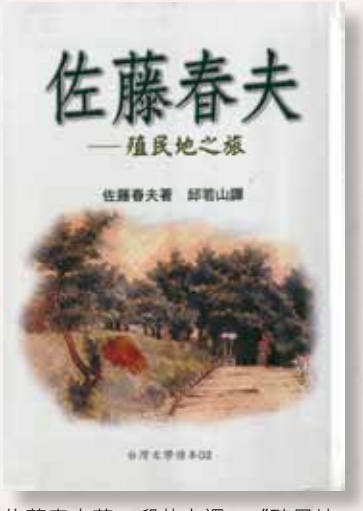
訪問的印象片段紀錄。這群日本旅人作家常被喻為以異國風情的視線凝視殖民地臺灣，其異地化（outlandish）臺灣的書寫題材，多聚焦於臺灣亞熱帶自然風景特徵以及以此為原鄉的臺灣原住民。佐藤春夫、富德蘇峰、北原白秋等人的臺灣書寫，均屬於此範疇。其中翹楚者，當屬受到島田謹二高度評價的佐藤春夫以及其〈女誡扇綺譚〉。島田謹二對此作的解讀與評價可說是多視角同時多樣化，但其中的「南國浪漫」的異國情調，卻成為此作評價的定調，時至今日。佐藤最為人所知的臺灣書寫當屬〈女誡扇綺譚〉（1924）以及〈霧社〉（1925）。此兩篇作品分別以臺灣的漢族與原住民為書寫主題，同時也反映當時日本文壇流行的文藝思潮；〈女誡扇綺譚〉以泉州話與廈門話語境的差異，結合當時偵探小說的機關要素，凸顯臺灣重層的歷史與語境。〈霧社〉對於資本主義與現代文明入侵原住民生活的描寫，其中可見出身新宮的佐藤春夫初期的社會主義傾向，也呼應當時普羅文學逐漸浮上檯面的控訴主題。之後大鹿卓的〈野蠻人〉（1936）、中村地平的《臺灣小說集》（1941）等作品，雖非完全是旅行文學文類，但二名作家均以私淑佐藤春夫知名，具有與其同質的美學要素，二人的原住民書寫，也沿襲佐藤春夫「南國浪漫」的書寫特徵。此外，女性作家的臺灣書寫，如真杉靜枝與坂口䙥子的作品主題，雖然不脫其同儕男性作家的書寫範疇，但因為性／別視點的介入，特別是她們的原住民女性主題書寫，如真杉靜枝「莎勇之鐘」作品群，以及戰後坂口䙥子從女性視點描摹「霧社事件」的相關作品，凸顯殖民統治下，性／別要素如何介入政治力學的結構。這是男性作家無法觸及，也可說是女性作家的臺灣書寫特徵。

在臺日人作家的臺灣書寫，西川滿與濱田隼雄可說是產量最豐的二位作家，即使文學品味與技法各異，但二者的書寫主題範圍大都侷限於在臺日人的共同體。此外，西川滿筆下的臺

灣，向來被貶抑為充滿「異國情調」；屬於普羅文學運動世代的濱田隼雄，其富於寫實性的筆力，則被國策文學的標籤所遮蔽。1930年代末期到1945年期間，臺灣文壇在戰爭體制的收編下，臺人作家的「皇民文學」與日人作家的「協力文學」被大量創出，也因為這樣強力的政治要素，這些文類時至今仍難以跳脫意識形態以外的解讀，缺乏整體性的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隨著日本帝國崩解，戰後臺日文學的臺灣書寫，則以糾葛的身分認同與複雜的重層語境各自記錄過去的殖民記憶。三位臺灣出身的作家——邱永漢（1955）、陳舜臣（1968）、王震緒（東山彰良）（2015）先後獲得日本大眾文學的代表文學獎項「直木賞」。邱永漢的《香港》與王震緒的《流》所書寫的臺灣，即使代表不同世代、族群的視點，無獨有偶的，都從「離散」（Diaspora）主題，呈現臺灣在各種時空的各種歷史面向。邱永漢在以《香港》獲得直木賞之前，以二二八事件以及海外獨立運動為書寫主題的《濁水溪》，曾入圍芥川賞。落選後，他幾乎抽去此作所有明顯的政治要素，以其中一部分改寫成為《香港》，之後獲得直木賞。其中的迂迴曲折，隨著邱永漢的作家身分逐漸被淡忘，幾乎無人回顧。在日本文壇向來以書寫中國著稱的陳舜臣，其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三部曲《憤怒的菩薩》（1962）、《青雲之軸》（1970~1972）、《半路上》（1999~2001、2003），近期將被譯介至臺灣，我們能藉此一窺陳舜臣如何書寫臺灣以及自己的身分認同問題。五歲便移居日本，但仍保留臺灣國籍以及中文名字的王震緒，其「東山彰良」這個活躍於日本當今文壇的筆名，乃源自祖父山東的祖籍以及雙親曾經定居的臺灣彰化，也是其對自己身分認同的一種強烈暗示。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香港》，允晨文化，1996年。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草根，2002年。

日本現代作家如丸谷才一的《假聲低唱君之代》（1982）、津島佑子的《太過野蠻的》（2008）以及吉田修一《路》（2012）等作品，或以臺灣為主題，或以臺灣為舞臺，世代、性別與描寫主題的差異，除了凸顯戰前至戰後臺日之間複雜糾葛、重層交錯的關係外，這些作品具有的共同特徵便是：即使作品世界裡，逐漸風化的殖民記憶以及戰後臺日關係的進程描寫共存，但臺灣的殖民記憶總是宛如鬼魅，如影隨形地籠罩整個作品世界。

今後臺日文學作品中的「臺灣」記號將如何繼續發酵，且讓我們拭目以待！